

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发展的 三大趋势

高祖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关键词〕 国际战略、安全环境

〔提 要〕 经过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年的持续演变，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发展趋势呈现新的特点。国际格局将逐步从“一超多强”走向多极化，国际体系将继续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加快重构，国际安全形势中失序和不确定因素更加突出。这些推动各国探求新的安全理念、战略和机制。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0)4 期 0025—08

〔完稿日期〕 2010年5月28日

2010年，世界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入第二个十年。在上一个十年甚至回溯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年，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历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粮食危机、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洗礼和催化，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不同程度地经历转型，转型的长期性、过渡性、渐进性、曲折性和多变性并存交织，量变的不断累积导致部分质变。未来5-10年，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安全将在嬗变中呈现越来越多的新特点，推动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进行历史性转换。

一、国际多极格局开始形成， 战略关系孕育新形态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对峙转变为“一超多强”，多极化渐成趋势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作为“独超”，连续遭受“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挫伤，综合国力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受到削弱。欧盟和日本分别通过加强一体化建设和自我变革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对稳定。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发挥优势，增强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这种演变使得“一超多强”格局日益呈现出多极格局的特征。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看，美国作为

“一超”的综合实力依然突出，但与世纪之交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明显下降，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

经济上，美国“独超”力量下降，“多强”力量上升的趋势不断增强。小布什执政的8年，美国经济严重滑坡，年均增幅仅为2.2%，比克林顿时期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更陷入深度衰退，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和-2.4%。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急剧下降，从2000年的30%以上降至2009年的23%。与此同时，欧盟随着扩员经济实力大增，在2004年其GDP即以超过美国；新兴大国经济长年保持快速增长，从2000年至2007年，“金砖四国”的增幅是美国的3倍，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其经济增长同美国拉开更大的距离，其中中、印这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和2009年的增幅分别为9%、7.5%和8.5%、5.4%。新兴大国的经济总量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以中国为例，1980年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7.2%，到2009年占到美国的34%，连西方学者预计2030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政治上，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温室气体减排、朝核、伊核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话语垄断和影响力下降，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力减弱。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四国”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以及多种区域合作机制等多层次平台上积极开展合作，群体性崛起的合力以及经济实力增长转换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增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扩大。

发展模式上，中国等新兴大国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应对危机方面彰显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种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发展潜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受质疑，主要兜售美国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严重受挫，遭到许多国家摒弃。

随着新兴大国继续强劲崛起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远超美国，未来世界力量对比态势将进一步朝着不利于“一超”的方向发展，多极格

局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现在认为世界多极格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已成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法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日益崛起，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为形成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将进入长达数十年的“相对大国时代”。^[1] 2009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由于新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中心的加强，一种崭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形成”。^[2]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题为《变革的潜力》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多中心世界秩序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9年推出的《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预计，到2025年，中、印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超越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世界八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正在崭露头角”。^[4] 英国国防部2010年发表的《全球战略趋势——展望2040》报告认为，全球权力中心将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转移，单极权力结构将变成由3个乃至更多国家或国家联盟组成的多极权力结构。^[5] 这些论断表明，在国际多极格局将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里变为现实或者至少开始形成这一点上，已经形成国际共识。

主要大国正是依据以上战略判断，着眼于在新的多极格局中谋求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和确保各自的战略利益，纷纷加强近中期的战略谋划，加快调整内外战略，力图抢抓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交替转换的战略主动权。美国对内在加强金融监管、对汽车等传统产业进行“再工业化”、推进医疗改革和增加就业的同时，谋求在新能源、新网络等新技术和新产业方面的新优势，力图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对外开启接触与合作时代，既调整和巩固与欧、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又推进与中、俄、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促进合作和减少竞争，使“多极世界”转变为“多伙伴世界”。^[6]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0年的欧洲战略》，把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增长，资源效率更高、更为环保

的和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增长,增进社会和领土凝聚力、就业率高的经济增长,作为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战略的相互强化的重点,力图把欧盟转变成一个提供高就业、高生产率与社会凝聚力、智能化、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以此重振科技和经济优势,进而谋求新的战略优势;同时,以《里斯本条约》的实行及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诞生为新起点,强化对外行动能力,抢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话语权,制定“真正的战略,把中国、巴西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力求改变过度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结构,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建设新的经济框架,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对外谋求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在积极参与多极世界秩序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世界战略稳定和与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用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来推进与美国的关系,通过搭建新的欧洲安全框架来调整与欧盟的关系,通过增加对“金砖四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依托来提升和保持国际影响力。日本民主党政府取代执政长达五十年的自民党政府后,对内改革官僚政治以促进自由竞争,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推进社会变革;对外进一步增强进取心,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加大亚洲外交力度,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重振在亚洲的影响力,并加强与中国、印度、东盟和俄罗斯的互动,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印度力求以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增长,以航空航天开发和国防建设为重点增强综合国力;对外,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为基点,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和强势周边外交,力求从地区大国跃升为世界大国。

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导致大国关系在多个层面同时展开新一轮调适和重组。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发达国家增加对新兴大国的借重,推动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对新兴大国可能构成的挑战加以防范和牵制,这已经构成新一轮大国关系重组的主线。从半球范围看,北半球的美国与欧盟、日本等对其传统盟友关系进行重新塑造和实现新的平衡。跨越南北半球的中国、俄罗斯、

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围绕因应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调整和扩展发展空间等问题既合作又竞争。从地区范围看,有美、欧、俄之间探索重建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安全框架,有中、美、日、印围绕亚太新格局展开角逐。从国别范围看,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将牵动新一轮大国关系重新组合;中美日关系寻求均衡化和稳定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金砖四国”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的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对抗性、竞争性与合作性同时存在,而以良性互动与合作为主。整个大国关系将呈现纵横捭阖、相互渗透的空前错综复杂的新形态。

二、国际体系进一步重构, 规制权 博弈持续深化

在国际格局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的过程中,国际体系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持续变革。经过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国际体系不仅层次发生变化,其中的行为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庞杂,而且运行载体、机制、理念和力量组合等均已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体系的新旧部分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交织、磨合和竞争,各种载体和机制将不断重构重组,权力结构将更趋多元化、网络化和重新机制化,整个体系的运行将变得更加复杂多边,并将在变乱中趋于有序。

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看,首先是行为体的数量大幅增加,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已经增加到194个国家,联合国成员国也扩大为192个。根据国际协会联合会2009年4月发表的《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提供的数据,目前该机构收录在册的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国际组织超过6万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有6782个,包括公民社会类1219个、文化类142个、能源气候类148个、教育类3938个、奥运或

体育类 1335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 53218 个。^[7]此外，跨国财团、宗教组织以及大量以互联网为联系纽带和载体的虚拟群体或组织数量都在增多，影响也在变大。其次，国际体系中不同类型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重要趋势是国际权力从国家层面向非国家尤其是商业和社会层面、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和扩散，导致“两降两升”：一是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二是现实社会中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下降，虚拟世界中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上升。

这种行为体数量和类型的增加和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增多及加重，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并已有所改革的现有国际机制变得越来越难以容纳、承载和有效运行，进而被迫深入改革和调整，转变思想理念，扩大代表性，调整和增强治理职能，逐步实现嬗变和自我超越。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以其为核心的整个体系构成了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支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体系为因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就开始进行适应性的改革。2005 年，联合国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用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改善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开启了安理会改革进程。2009 年，有关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启动，各方围绕改革方案、扩大后的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英法所提延长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的过渡性的小幅改革方案得到较多呼应，新当选的第 64 届联大主席特赖基表示任期内将继续现有改革进程，改革后的安理会可能形成三个层次的等级结构，第一层次为原来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层次为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及两个非洲国家（其任期在两年以上），第三个层次为原有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同时，进一步改革专门性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前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 5% 甚至更高的投票权，后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3% 甚至更高投票权。金融稳定论坛变成金融

稳定委员会之后，可能围绕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监管等问题进一步调整和探求发展方向。世界卫生组织在 H1N1 等疫情泛滥的推动下，在疫情发布、疫苗研发、治疗指导和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联合国粮农组织自 2007 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以来，以官员绝食、举办粮食峰会等方式成功地将消除饥饿人口、确保粮食安全的理念推至全球各个层面，并确定将其下属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造成“最重要、最广泛的消除世界饥饿的国际交流和政策协调平台”，^[8]强化职能的趋势愈益彰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向新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上升。改革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提高其应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新形势的行动能力、国际能源机构是否要把中国吸纳为新成员以扩大代表性和加强职能等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紧迫。

在大国关系和地区层面，各种合作机制均不同程度地寻求改进和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促进地区与全球治理。成立于 1999 年的二十国集团（G20）经过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催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的强劲拉动，其地位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已经成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和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在 2010 年加拿大和韩国两次峰会的打造之后，它将进一步建章立制，在全球经济的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八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地位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寻求重新定位，可能进一步向十四国集团演变。“金砖四国”峰会从概念走向现实，并朝着兼顾有效务实合作和准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探求从美欧传统盟友关系框架下的区域性军事政治机制，发展成为与“民主国家同盟”理念相配套的全球性“磋商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心”。欧盟在《里斯本条约》通过之后，加强欧盟委员会主席、轮值主席国元首与新设的欧盟“总统”、“外长”等之间的领导机制整合以及内外政策整合，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扩大、深化、提升；东盟一体化在曲折中坚

持推进和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10+1”与“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美国与东盟启动“1+10”机制以及推动“亚太自贸区”计划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由起初的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四国增加了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秘鲁，变成八国）的整合，将进一步刺激亚太各种合作机制的发展。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向共同体建设迈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把“非盟委员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专门负责非盟防务、外交与外贸谈判等事务，力图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在应对诸多挑战过程中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在思想和理念层面，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等思想不断发展，影响持续扩大。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发展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在经济领域，节能、低碳、绿色、可持续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已经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主流思想，推动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技术、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实现突破。在安全领域，“失败国家”成为国际体系重要威胁的论调影响持续扩大；以实现“无核世界”为目标的全球性“零核运动”推动核不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取得进展；有关海洋、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地”发展与安全的新理念，因应国际竞争转向这些领域的需求而产生。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传统准则发生调整，“良政”、“保护的责任”和“负责任的主权”等理念和实践影响扩大，主权主动让渡与被动侵蚀增多，内政国际化与外交国内化和国际化趋势变得更加突出，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削弱。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

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把世界推入建章立制的新规制时代，这意味着通过在会议室里和谈判桌上调整厘定规则和机制来实现国际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将起而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就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储备货币变化、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重建、油气和铁矿石价格谈判所代表的能源资源秩序调整和重建、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与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所代表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国际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多变。

三、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模式亟待创新

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展开在安全意义上意味着增加乱象和失序，国际格局的转换和体系的重构势必造成权力的真空，新旧事物并行交替势必产生摩擦和碰撞，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困难和寻求转型势必增加不确定性，所有因素汇聚交织将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从大国战略竞争方面看，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和国际多极格局逐渐显现的背景下，大国之间在相互利益依存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相互关系日益呈现竞争与合作同步加强的景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但是，由于世界正在经历全面转型，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主要国家为了更好地因应大变局和确保各自战略安全，即使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

况下,依然纷纷加强军事战略力量,包括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美国2009财年的军费开支高达5854亿美元(不含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费用),比2008财年上涨7.5%,2010财年更是高达6800亿美元;^[9]发布《国家情报战略》、《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计划》,加紧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转型,在反恐、防扩散与防范中俄崛起之间寻求“平衡”,一个强调从内部进行渗透的“软战争”、重点发展信息武器和“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新的常规威慑性武器等内容的美国新军事战略已现雏形。俄罗斯2009年军费开支达941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增长了27%,^[10]还出台了《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和“新军事学说”等一系列近中期战略文件,推进军备升级,把提高机动性和快反能力作为军队改革方向的核心,把确保边界安全与资源获取作为常备部队的战备重点。印度更是连续几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2009年军费达264亿美元,涨幅达21%,着力加强海陆空和太空战略力量建设,对外军购开支居世界前列。^[11]澳大利亚首次发表国防白皮书,未来20年澳军费总开支将达2263亿美元,军队规模增加10%。^[12]

在持续加强军备建设的同时,大国传统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转向亚太,纷纷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亚太格局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国际格局交替转换的走向。“新边疆”的角逐则围绕海洋、太空与网络等所谓“全球公地”的战略优势竞争展开。世界主要大国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包括不断提升海洋在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积极推进海洋战略实施和壮大海洋综合开发能力,围绕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划界以及战略通道安全保障问题加紧文攻武备。北冰洋、印度洋、中国南海和东海等主要海域集结多重阵形组合。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竞相通过立法、建军事基地、军演等加紧抢占北极“战略领地”;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利用南极海域的“法律真空”抢占地域,宣示主权。多个国家加大太空开发的战略投入,军民综合利用保持

主导,但军事用途仍是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美、日、俄、印等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及力量,使得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加快向网络战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借助网络优势谋求巩固对国际体系重构的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的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化。

从核武器问题的发展趋势看,这个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安全问题,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开始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美国作为影响国际核战略安全的首要因素,其包括有条件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内的战略调整,给核问题的发展增添了变数。一是在奥巴马提出构建“无核世界”的目标和相关计划、安理会峰会通过旨在消除核武器的相关决议、美俄2010年4月签署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华盛顿核峰会召开以及《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举行、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组建的“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国际委员会”将公布建立“无核世界”的具体进程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核裁军将渐入高潮,相关博弈也将进一步展开。二是奥巴马政府很可能以与俄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新条约和华盛顿核峰会召开为契机,乘势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生效和《禁止可裂变材料条约》出台,并推动实施“核燃料库计划”。但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不小,核军控形势依然严峻。三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朝方两次核试验的打击下遭受严重挫折,尽管六方会谈框架继续发挥作用,但由于朝鲜已实际拥有核武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更加艰难;伊朗核问题在伊国内各派较量加剧和伊美关系依然处于对抗状态的情况下,僵局难以根本打破;有关叙利亚铀浓缩工厂的核查毫无结果,非天然铀痕迹仍无定论;特别是美国坚持在核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继续默许以色列拒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使国际核扩散危机愈趋严重。四是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核废料污染及民用核技术转军用的风险

巨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2009年全球核能项目井喷式上马，在建核反应堆数以百计，^[13] 加大了国际防核扩散的难度。五是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在防止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及其他非授权行为者获取核材料和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核恐怖主义作为对国际安全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之一仍在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称核恐怖主义是“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情报部门认为“恐怖分子已下定决心购买、制造或盗取核武器”。^[14] 巴基斯坦核武器、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和墨西哥等国核材料的安全备受关注。

从“自然安全”问题的发展看，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问题，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是确保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奥巴马政府力推“绿色新政”和开发近海油田，旨在规避高油价风险，确保美国能源安全；俄罗斯2020年前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排除以军事力量”保卫能源安全；英国制定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三位一体”的能源战略，将在2025前新建10座核电站以保障能源供应；^[15] 印度实施能源安全政策，核心是建立90天的能源储备制度，同时鼓励企业海外并购，确保能源生产每年增长5.8%。^[16] 二是油气特别是水资源问题等导致国际国内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上升。亚洲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围绕阿姆河、锡尔河水源，印度和孟加拉国围绕恒河水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围绕供水价格，湄公河上下游国家的矛盾分歧，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围绕水资源分配，也门各派武装围绕水源，非洲苏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围绕尼罗河水源等等，纷争不断。三是全球粮食危机难以消除，饥饿人口不断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10月发表报告称，全球“饥饿人口”已达10.2亿，新增的近1亿“饥饿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三分之一儿童营养不良。^[17] 四是大规模传染病和极端自然灾害的威胁依然严峻。根据世卫组织（WHO）统计，甲型H1N1流感疫情截至2009年12月30日共造成

12220人死亡，仅美洲地区就达6670人。虽然各国通过技术防护和注射疫苗等措施积极应对，但由于感染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地震、干旱、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防控难度增大，造成的损害不断加重。

从恐怖主义的发展看，这个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际安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在第二个10年将继续发展。在组织形态上，“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全球化、分散化、小型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虔诚军”所代表的另一类恐怖组织的威胁明显上升；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开始显现，反恐的难度将变得更大。在地域范围上，南亚依然是恐怖主义高危地带和国际反恐核心阵地，美国推行阿——巴全面新战略使恐怖与反恐的较量变得更加激烈；巴基斯坦加大反恐在招致塔利班报复的同时，也面临其他极端主义势力的暴力恐怖威胁。中东和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回升，也门和索马里等国的恐怖与反恐形势恶化，在美英等国反恐议程上的排位大幅前移。美欧内部的恐怖组织和个人构成的威胁有新的发展。

从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看，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2050年将达到91.5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18]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的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范围内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大规模流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加速导致人口从乡村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以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缩小分化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壮大，导致社会矛盾、族群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政治稳定程度普遍下降。加上在全球经济经历转型的背景下，各类国家不同程度地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信息化条件下虚拟社会和“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等等，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发酵作乱提供了较为肥沃的社会土壤。

以上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

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国家治理模式和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成本越来越高,安全理念、安全战略、安全机制和维护安全的能力亟待创新加强。

对于身处转型世界的各国发展与安全来说,上述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安全三大发展趋势所体现的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的转换,既蕴涵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也潜藏着多种问题和风险。机遇与挑战深度交织、复杂联动、互相转化,利弊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把握与应对。

注 释:

- [1] “解读萨科奇的相对大国论”,新华网,2008年1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08-01/24/content_7480495.htm.
- [2]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 мая 2009 г. № 537 13.05.2009. <http://www.scrf.gov.ru/news/437.html>.
- [3] Лавров С. Потенциал перемен.--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н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координат. 8 сентября 2009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с.1, с.9.
- [4]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9-20页、138页。
- [5] 英国国防部: 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 2010年2

月, http://www.mod.uk/NR/rdonlyres/38651ACB-D9A9-4494-98AA-1c86433BB673/0/gst4_update9_Feb10.pdf.

- [6]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oreign Policy Addres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July 15, 2009.
- [7] 国际协会联合会(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国际组织年鉴 2008-2009年》,2009年4月, <http://www.uia.be/studies>.
- [8]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将改革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新华网,2009年11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24/content_12533404.htm.
- [9] “2010年各国军费重点转向何方”,新华网,2010年3月31日, http://www.news.xinhuanet.com/mil/2010-03/31/content_13274027.htm.
- [10] “西方惊讶中国军费下降”,中广新闻网,2010年3月5日, http://www.cnr.cn/junshi/ztl/zh/mtjj/201003/t20100305_50614502.html.
- [11] “2010年各国军费重点转向何方”,新华网,2010年3月31日, http://www.news.xinhuanet.com/mil/2010-03/31/content_13274027.htm.
- [12] 同注释[10]。
- [13] “综述:核电在全球王者归来”,人民网,2009年4月9日, <http://www.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4/57866/11334272.html>.
- [14] “世界濒临核扩散引爆点 零核计划寄望美俄峰会”,人民网,2009年7月2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9579103.html>.
- [15] “俄新军事学说不排除先发制人核打击可能性”,人民网,2009年10月15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00354.html>.
- [16] “印度拟 2012 年增建 500 万吨战略储油基地”中国贸易投资信息网,2009年12月16日, <http://www.cacs.gov.cn/jidian/show.aspx?articleId-64036>.
- [17]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全世界饥饿人口突破 10 亿”,人民网,2009年10月16日, <http://nc.people.com.cn/GB/61155/10203900.html>.
- [18] “美国人口统计局:全球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快”,人民网,2009年7月30日, <http://www.health.people.com.cn/GB/14740/22121/9754255.html>.

(上接第 51 页) 环境的影响,做出全面的战略性研究和判断。

注 释:

- [1] *Panorama of Energy: Energy statistics to support EU policies and solutions*, Euro stat Statistical Book, 2009 edition.
- [2] 同注释 [1]。
- [3] European Commission: *Market Observatory for Energy Report 2009*.
- [4] 杨光:《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61页。
- [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nergy/Climate Change Elements OF the Final Compromise*, 2008. European Parliament: *Climate and energy package: texts adopted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t the sitting*

of 17 December 2008.

- [6]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s and Nuclear Safety Report*, March 2010.
- [7] 世界能源金融网:《中亚能源之争日渐白热:大国博弈风云突变》,2009年12月。 <http://www.wefweb.com/more/>.
- [8] 邓颖平:《能源“点燃”欧盟的中亚新政策》,中国新闻网,2008年9月, <http://news.sina.com.cn/o/2008-09-20/101714475680s.shtml>. 赵会荣:《欧盟的中亚政策》, <http://zhaohuirong.blshe.com/post/9916/327883>.
- [9] 韦德里纳:《欧洲与能源》,法国《国际政治》2009年秋季号,总第125期。
- [10] 《纵横周刊》:《纳布科折射欧盟能源战略的分裂》,2009年8月。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54e288d08b31bcc>. 中国化工信息网:《拒绝恶意兼并 南流纳布科暂不联合》,2010年3月。 <http://www.cheminfo.gov.cn/zxxz>.

PRÉCIS

History and Prospec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This year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India diplomatic relatio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njoyed smooth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twists and turns and witnessed the rainbows after the storms. By and large, friendly cooperation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of bilateral ties as well as a general trend. As two fast-emerging giants, sound and stable relations are not only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people, but also conduciv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ere is broad prospec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New START Treaty and Dream of Nuclear-Weapon-Free World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Dmitri A. Medvedev recently signed the New START nuclear arms reduction treaty at Prague Castle. It is claimed that this represents certain progress in global arms control; however, the agreement is more of symbolic significance rather than substantive effect at greater depth.

Major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have taken in shape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global security landscape.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will shift from "one superpower and many great powers" to greater multipolarit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estructuring via peaceful means; disorders and uncertain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will be more prominent. In such circumstances, countries would pursue new security concept, security strategy and related mechanism.

Review of Japan's Implementation on Major-Power Strategy

The Major-Power Strategy of Japan which was initially raised in 1980s has failed in its practices. The reason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the misread and improper use of economic strength, the one-side unilateral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appropriate "hereditary politics" and the ingrained Island-Mentality.